

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

——历史真实与档案记录

孔繁芝 尤晋鸣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怀抱东山再起的梦幻,策划实施了战败“山西残留”:利用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并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想着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提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保留武装,伺机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但最终遭致彻底覆灭。

关键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战败残留 军国主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按照《波茨坦公告》与国际公法规定: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接受拘捕,交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但是,在中国的山西,却有日军及其他身份的日人万名以上,有组织地残留,成建制地拥有武装,附植于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和经济、政治、情报、文化等组织机构,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等日本战犯,继续逍遥法外,破坏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残留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者,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人。面对日本本土被他国军队控制及殖民地丧失的现实,“在海外的几百万日军日侨,是顺从地卷起旗帜、沮丧地回国呢?还是想什么别的办法把日本人的势力残留海外,以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呢?”^①投降书签字不久,日本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

^①〔日〕城野宏著,叶昌纲、金桂昌等译:《山西独立战记》,载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45辑,1986年印,第12页。

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①这一图谋,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在东北、华中和华南等地日本人中,“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顾虑,也化成泡影。但在山西省,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与条件,日军残留的图谋却得以实施。经济方面的原因,是策划者对山西资源深深觊觎的战略阴谋,即利用和掠夺山西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生产力,服务于他们图谋的战败“复兴”。政治方面的条件,是军阀阎锡山的存在,特别是日本侵华期间“对伯工作”(阎锡山,字“伯川”)的基础,及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利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正由于此,日本军国主义描绘的构想——战败后的日本为了复兴,须有山西省丰富的经济资源牵引,作为1941年9月《日本军、山西军基本协定》的延长,即经由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通过第一军的战后“残留”来实施。于是,驻晋第一军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酝酿并策划、实施了战败后的“山西残留”;在阎锡山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使山西成为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

一 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

日本战败后,向中国第二战区投降的驻晋侵华日军,是组建于1937年秋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其司令部驻太原,司令是澄田睐四郎中将,参谋长是山冈道武少将。该军下属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坂井直俊少将;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少将;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旅团长山田三郎少将;第五独立警备队,司令原田新一少将。其他还有集结大同、朔县一带的第四独立警备队,原隶属司令部设在张家口的驻蒙军,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也划归第一军指挥,由第二战区受降。第四独立警备队司令是坂本吉太郎少将。据北平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1946年12月的《状况报告·山西的报告》称:1946年1月,集结山西的日军总数为58000人。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上旬到9月上旬,山西军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人,就日军投降与第二战区受降,多次进行接触、交涉。期间,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问题。随后,双方即派员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山西军的编制下;阎锡山对“残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厚条件,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基础上提高二级……^②10月间,阎、日成立“合谋社”,取共谋其事之意。合谋社设在太原海子边原日华俱乐部,社长为阎锡山的堂妹夫梁缙武。其下设军事组、经济组、总务组、文化组,组长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就在这里,残留活动的策划组织者山冈道武、岩田清一、城野宏,与阎锡山方面的赵承绶、张文昭、梁缙武等,“合谋”了日军残留、组编“特务团”等计划,台后则是澄田睐四郎和阎锡山。

对于日军残留山西、重新进行武装的实施,因事关违反《波茨坦公告》,策划者们在名目和形式上费尽心思。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对阎锡山说,在山西的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可能,可以考虑

^① 赵知云:《日本投降后的冈村宁次》,《文史月刊》2005年第2期,第63页。

^②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留一部分,最好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尤其对日本居留民,只要他们愿意,全部留下也无不可。^①1946年1月和2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开始组编。而名为“个别发动”“志愿残留”,实际则由第一军参谋长,使用着同日军投降前并无二致的电文格式及电报稿纸,直接将残留日军名额分配到受统属和指挥的部队,相关情况并随时电报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和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但在形式上却绕着圈子,由阎锡山向“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澄田睐四郎发出征用令,再由日本第一军将名额分配各兵团。

1946年1月12日和1月25日、2月5日,阎锡山方面发出组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征用令。2月2日、2月8日,第一军参谋长向各部队发出电文,分配任务和名额。2月2日电文内容为:被征用人员,负责南同蒲线2500名;负责东潞线2500名;负责北同蒲线3000名,共计8000名。征用人员名额分配如下:第一一四师团2500名;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2500名;独立混成第三旅团1500名;第四独立警备队1500名。^②2月8日电文内容为:负责修复正太线1500名,由第五独立警备队负责组建;负责修复太汾线1500名,由独立步兵第十旅团负责组建。^③至此,第一军下文征集残留军人名额,两次共11000名。第一军并分别以“乙集参甲电第108号”、“乙集参甲电第130号”^④报告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而在2月2日同时发出的“乙集参甲电第107号”《关于征用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详细指示》^⑤中,第一军掌控残留日军的旨向更为明确。电文为:“所隶属及指挥的各部队;关于征用铁道修复部队一事,现规定如下:(一)……(四)对铁道修复部队下达的命令,经由日本军司令官转发。(五)第一一四师团长、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第四独立警备队司令官,可在分配征用名额范围内,根据需要组成铁道修复部队。此部队的部队名,在铁道修复部队之上冠以兵团番号。(六)根据上项规定组建的部队,在组建完成的同时配属于担任组建的兵团。(七)担任组建任务的兵团长,根据上列各项规定组成铁道修复部队后,应将详细情况报告军司令官。”电报同样报送总军(中国派遣军)、方面军(华北方面军)。为适应残留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需要,第一军又以“军事绝密”电文,于1946年2月至3月先后通知下属单位:“援助指导”二战区组建“特务团战车队”、“特务团工作队”、“特务团培训部”、“特务团兽医队”、“特务团医院”,要求相关兵团和单位选出组建负责人,征集残留人员。

在第一军司令部下达电文,组建残留日军部队的同时,策划组织者与各兵团骨干分子,并以宣传倡导、威胁欺骗并用的手段,通过召集会议、巡回演讲、说服动员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发动组织。这一时期,城野宏所撰《日本人的立场》^⑥成为传播残留理念,发动日军日侨残留山西的思想武器。该文被第一军印成小册子,与其他残留言论相整合,散布到各部队和日本侨民中。其内容的主要观点有:要卧薪尝胆,为了复兴祖国而残留;大和民族是永远不会战败的,复国希望为期并不太远;美苏矛盾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爆发,日本陆军必定参与交战,“海外雄飞”的春天必然到来;日本在美军占领的状况下,立刻重新武装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要留在山西保存武力;从维护日本的天皇制国体方面,中国赤化会产生重大的危险和影响,日本人防止中国赤化,毫无疑问是爱国行动;日本战后将发生社会混乱,即使立刻回去也不可能期望安定的生活,现在阎锡山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宿

①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精选5——阎日勾结真相》,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②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1-2-5。

③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1-2-17。

④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1-2-10、15。

⑤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1-2-8。

⑥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及给养、结婚等方面也给予保证；将来残留者不仅仅是参加武装部队，也可以根据个人能力发展，比如经营轩岗煤矿及石灰生产，经营龙泉庄农场……

而各部队残留活动的组织者，对下级官兵的威胁、命令和欺骗也随处可见。如果一部分军人不留下来担负山西铁路、公路修复任务，担任后卫尖兵，第一军的复员归国非常困难：“我不回国，你们也都给我留下！”“军队的1/3分配为残留，你要留下！”“回国由军令决定，当前只有完成上级交给的组建特务团任务”；“我们现在复员回国，但请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返回，与诸位见面”。第一一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等，还成立特务团编成室、“独三旅会”、“宫城县同乡会”等，开展残留活动。组织者并派出日本宣传员，在山西之外的北平、石家庄等地的日军日侨中进行宣传、煽动，说服他们下定决心残留下来，报效国家。仅石家庄即有日人200余名来到山西，加入残留队伍。据合谋社军事组秘书平部朝淳证词，第一军下达征集残留日军11000人的任务，到1946年4月中旬，实际达到数约六千六七百人。^①在大规模残留活动中，原驻山西侵华日军将官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三浦三郎、元泉馨、坂井直俊，都成为残留活动的组织者，并残留下来，担任残留部队首领和阎锡山的高级军事顾问。

二 残留日军隐匿与整编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山西日军有组织残留、成建制武装，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揭露、批判，也引起军事调停“三人小组”的重视。1946年1月，八路军即向驻东沁线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元泉馨部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保持和战争结束前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波茨坦公告》。”^②2月，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代表，专门到“东沁线”视察。3月3日，“三人小组”美方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与北平“军调部”代表等，又专程到太原视察。为暂避风头，第一军于1946年3月4日通知日军各部队，对残留于铁路（公路）修复部队者，办理退伍手续。实际只是“瞒天过海”、欺骗视听，并未告知残留部队全部军人。而当时日本原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对第一军残留于山西的图谋和行动，在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组建时，即给予认可，这以第一军发给“总军”“方面军”的多次电文即可证明。此时，为避免承担违反《波茨坦公告》的责任，日本原中国派遣军以“总参电718号”通知第一军：希你军根据前已颁发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坚持除真心希望残留的部分技术人员外，（根据“诚字21号”征用的人员，应属于高级技术人才，符合智力征用条件）着令全部军民回国。“特别是编入特务团重新武装一事，不仅有悖圣旨，违反中国训令，而且可能引发国际问题，希立即停止将残留人员编入特务团的活动”。^③4月5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日管组也以“日管教字第642号代电”通知第一军：我部于1月12日下发命令，征集参加我部直属特务团志愿人员，组建示范部队并教练军官，着立即予以撤销。^④4月6日，第一军电复南京中国派遣军：我军据此下令全部撤回加入特务团人员，并遵令遣送回国。但就在同时，第一军又向中国派遣军声明：“按照钧电意图着令侨民回国一事，因为违反中方及希望残留人员的意愿，既然军方没有强制权力，就无能为力。有相当多数的侨民公开对我官兵开展挽留活动，对此亦无权加以阻止。”^⑤对所隶属和指挥的部队，则继续

①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②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1-24。

③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78。

④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62。

⑤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78。

通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说，如成为中国人就可以残留，如果从法律上不可能办理取得国籍的手续，可在行政上（在警察署登记）采取变通办法。”^①更为露骨的是，1946年5月5日第一军在司令部人员从太原遣归日本前，发给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的电文中，仍以“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事项”报告：“从山西省留用的技术人员看，大部分残留侨民是本身希望留下，加之阎长官积极劝说，军方实无力扭转。我军虽着令山冈参谋长等部分人员暂时留下，努力促成残留日人的遣返，但从目前情况看，并无任何效果。相反，似以采取默认态度为好。”^②显然，立即停止日军残留、重新武装，“努力促成残留日人的遣返”，只是假话而已；“似以采取默认态度为好”才是真实用意。况山冈道武作为坚持残留活动的主要倡导策划和组织实施者，实际做的恰是正好相反的工作。而“留用的技术人员”，主要即是伪造身份的残留日本军人，连元泉馨、岩田清一等，也都列在留用技术人员的名册上。自然，在此期间残留日军不得不分散隐匿或遣返归国。但就在5月，岩田清一、今村方策、城野宏等人，即又聚集太原谋划残留部队的整编。残留日军主体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除遣返回日者外，与残留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等合并，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继续残留^③，且之后又有新招募，吸纳日本军人和侨民进入山西。组织者并多次派人回日本，联络军国主义分子进行组织“义勇军”来华的阴谋活动；还派人到上海、北京等地活动，企图建立与日本的联络据点，开辟中、日间密航路线。这些图谋，只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迅速发展才未得实施。

三 残留日军部队与顾问机构

从残留活动的策划开始，军国主义分子们就认为“只有残留强有力的日本人的军队”，残留势力才能“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发言权”，以实现“东山再起”之残留目标。因而，整个残留活动是由军事残留发端，并始终作为实施的重点，决定和影响全部残留过程。其军事残留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组编残留日军武装部队，及设立残留日军高级将官顾问机构。

组编残留日军武装部队，开始于1946年1月。在当时形势下，采取了编入山西军的“残留军事体制”。其主体部队的编成，大体经过大规模发动组编时期、统一整编时期和政治军事管理正规化时期三个阶段。

（一）大规模组编时期：1946年1月到1946年4月，武装部队名称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1月间，残留日军武装部队“特务团”在阎、日合谋下开始组编，总人数预定为15000人。经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发出征集令，日军第一军向所属兵团下达征集名额与组编形式，伴随从上到下大规模的组织动员，编为7个团及大同总队。特务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副官处、经理处、军医处、兽医处、军械处，办公地点就在太原市新民北正街原第一军司令部，后迁至工程师街四号。原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任总指挥。一一四师团参谋太田黑，第一军司令部参谋西山、岩田清一等人，分负作战、教育、编成等责。三浦三郎、太田黑未到职，实际由岩田清一掌管司令部。^④为适应残留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需要，2月至3月，第一军下文“援助指导”二战区组建“特务团战车队（特务部队）”、“特务团工作队”、“特务团培训部”、“特务团兽医队”、“特务团医院”，要求相关兵团和单位选

①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1—2—106。

②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1—2—125。

③ 太原市档案馆藏，档号：J1—3—123—22。

④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出组建负责人,征集残留人员。1946年1月25日和2月5日,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又以修复南同蒲线、北同蒲线、东路线和正太线、太汾线名义,征集残留日军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按第一军电文下达的征集名额,总数为11000人。编成的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下属7个工程队和驻大同的第八工程队。关于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组建,第一军在2月5日电文中指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组建,希以特务团同意留用人员为主体(第一特务团除外)。”故人员编成与特务团存在交叉,名称也混淆使用。到1946年4月中旬,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实际编成人数为六千六七百人。

(二)统一整编时期:1946年5月到1947年5月,武装部队名称为“保安总司令部”、“山西野战军”。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山西人民对侵华日军“残留”高度警觉,公开揭露,“三人小组”与“军调部”代表专程视察调查,残留活动组织者不得不谎称“撤回加入特务团人员,并遵令遣送回国”,实际上却处心积虑地策划着继续残留,以“就地复员”、伪造技术人员身份作掩护,将武装部队暂时分散隐匿。1946年5月,除遣返者外仍有约半数以上残留于山西。而在此时,即又进行残留武装力量的统一整编。残留活动组织者与阎锡山方面合谋,将名义上撤销的残留日军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与残留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五台工程队、保安警察队等,合并整编为山西保安总队。1946年6月,保安总队设总司令部。山西军方面赵承绶挂名任总司令,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任副总司令,岩田清一以高级参谋掌握实权。保安司令部下属6个保安大队(后改为“保安团”)和通讯队、工程队。另有大同保安总队及下属七、八、九大队。1947年3月,保安总司令部改称“山西野战军司令部”。司令部下属各大队及工程队、通讯队等,名称相应改变。赵承绶、元泉馨仍任正、副司令。

(三)正规化时期:从1947年6月残留日军改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1948年3月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到1949年5月前残留日军覆灭。1947年4月至5月的正太战役中,山西军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被解放军成建制消灭时,残留日军即使用了“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的名称和正规军编制。这一时期,残留日军有了更加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政治、军事管理,提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根本宗旨,制定了《总队部服务规定》、《政治部业务规定》等规章制度,残留活动更具号召力和凝聚性。第十总队司令部具有独立掌握作战指挥、人事任免、福利待遇、武器给养的权利。其办公处所称“复兴楼”,为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所在地。总队长由原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担任,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九大队大队长相乐圭二任参谋长。其内设机构有总队长室、政治部(后改新闻处)、参谋处、副官处、后勤处、军械处、卫生处、配给所、自给对策委员会、营缮对策委员会等。第十总队下属一、二、三、四、六团和大同总队,直辖特务营、通讯营、工兵营,编制总人数为9726人(不包括大同总队)。其中日系军人2447人、华系军人7279人^①,骨干人员基本为日系。

1948年3月16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第十总队原属五个团中,二、六两团编为军士教育一、二团,一、三、四团编为教导一、二、三团,原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编为特务大队、工兵队和通讯队。改编后的第十总队实质并无变化,向上报送材料或习惯上有时仍称第十总队。如,山西军向国防部的统计上报等材料中,还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称出现。今村方策仍任司令部司令,原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炮兵大队大队长菊地修一任参谋长。晋中战役后,参谋长由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通信队队长今野淳担任。1948年11月今野淳在太原战役中被打死,原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十大队中队长早坂巽藏任参谋长。教导总队内设机构为: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政工处、军需处、卫生处、秘书室,及生产部、合作社、农场、野战医院等。

^①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49-229。

由于晋中战役后残留日军人员锐减,太原战役中损失严重,教导总队作战部队曾先后进行编队调整。1948年10月,军上一团、军十二团合编为步兵一团;教导一团、教导二团合编为步兵二团;教导三团、特务大队合编为炮兵团;司令部直辖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输送连、野战医院等。1948年12月,作战部队整体编为炮兵队,下属三个炮兵营、直辖步兵营及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输送连、野战医院等。不过直到1949年4月,教导总队原军上一团、军十二团、教导一团、教导二团、教导三团的建制、称谓仍然存在。

山西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中,原第四独立警备队大同残留日军武装,与第一军残留日军武装既相互配属,又相互独立。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独立警备队隶属于司令部设在张家口的驻蒙军,日本投降后划归第一军指挥。由此,第一军对第四独立警备队实施了残留活动的组织。司令部参谋、残留活动主要倡导策划者岩田清一,多次与大同日军密谋,策划特务团的组建。1946年2月2日,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所发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电文中,分配第四独立警备队残留名额1500人。2月5日,山冈道武又就“征集人员组建特务团战车队”密电第四独立警备队参谋长。在1946年春大规模残留活动中,大同残留日军官兵近700名,编为特务团大同总队。原第四独立警备队司令部部附林丰任总队长,第四独立警备队独立步兵二十二大队大队长五味丑之助任副总队长。后特务团大同总队编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第八工程队,同年6月后改编为大同保安总队,下属第七、八、九大队,有日籍军人600名。林丰任总队司令部司令,五味丑之助任副司令。1947年3月,大同保安总队改编为山西野战军大同总队,辖七、八、九、十大队。同年6月后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大同总队,辖七、八、九、十大队。林丰仍任总队长,五味丑之助任副总队长。同年9月部分官兵遣返后,10月份实有日籍军人339名,华籍军人1936名,总计2275名。1947年12月第十总队大同总队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

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之外,还有以残留日本军人为骨干组建的“机甲队”,于1946年秋编成。司令、总教官为原日军少佐大队长赤星久行,副司令由华籍少将韩文彬担任,参谋长为原日军电信第九联队大尉宇野昭夫。按照1946年9月制定的《机甲队司令部服务规定》,机甲队“司令直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率机甲队。关于训练和指挥,按总顾问之指示处理”。司令部内设机构有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等,下属战车连、炮兵连、补充连、步兵连、通讯连、输送连,及工兵排、整備排、特务排、装甲车排。该机甲队武器装备也较精良,配置坦克、装甲车、轻炮、重机枪等。据1947年9月统计数字,机甲队编制人数1556名,实有官佐(以日籍为骨干)188名、日籍教官104名、士兵1120名、夫役88名,共1500名。

设立残留日军高级将官军事顾问机构,是阎、日“共谋其事”的高端形式,也是残留日军“取得对阎锡山的发言权”和阎锡山笼络残留日军将领的重要途径。1945年9月,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就当起了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总顾问和副总顾问。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也被聘任为顾问。1947年6月,山冈道武(汉名武道三)专门设立“武顾问室”,三浦三郎(汉名蒲晋业)设立“蒲研究部”,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汉名元全福)设立“元副总司令办公室”。1948年晋中战役后,因战犯身份一度“受审”的澄田睐四郎(汉名郑天来),又设立“郑总顾问室”,在太原战役中为阎锡山制订作战计划与战术方案。这些侵华战争中的高级将领,不仅参与阎锡山军事决策,并且搜集情报,研究形势,指导残留活动。

四 从残留理念到残留纲领

日军残留山西,有着明确的目标宗旨。以《日本人的立场》和《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服务规

定》为标志,从最初的残留理念,发展为成熟的残留纲领。当残留活动组织实施之初,倡导、策划者也担心:“这种与所谓奉天皇之命情理不合的军队,会由于建军宗旨不明确而成为阎锡山的雇佣兵性质,这样的军队能否维持其战斗力,保持其团结?”他们意识到,残留活动需要“一面使之合法化的旗帜”。于是,城野宏所撰《日本人的立场》便应运而生。其主要内容为:日本被盟国军队占领,丧失主权。战后所走的道路,可能有三种。一是美国化的道路,在美军占领下,政治上丧失主权,经济命脉被控制,文化被殖民地化,有成为夏威夷第二的可能性。二是苏联化的道路,战后民众的左倾化不断发展,也有变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可能。这与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体不合。三是日本独立的道路,恢复主权,再次作为繁荣昌盛的强国登上世界舞台。为了争取第三条道路,在要求占领军迅速撤离的同时,必须把主要的经济复兴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在山西建立起一支日人武装部队,协助阎锡山反对共产党,就一定取得对阎锡山的莫大发言权。在这个基础上,打入日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而掌握工矿等经济命脉,就可以保持和日本占领时一样的状态。日本虽因战败而失掉了……一切殖民地,但和阎锡山拉起手来,日本还可以将山西作为实际上的殖民地而保存着。日本依然可以从山西获得煤铁等各种重要工业原料,同时也保持日本商品的销售市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起,山西立刻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正是以《日本人的立场》为代表的“观念性目标”,为日军战败残留树起了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以军人为主体,动员和聚集了万名以上的残留者。

之后,随着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残留日军的整编和正规化建设,日军战败残留的思想理论进一步发展。残留日军部队在自己的队旗上,公然宣示了“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阐明残留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天皇的军队”而区别于“阎锡山的雇佣兵”。1947年6月,残留日军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随即制定了《总队部服务规定》^①等成体系的章则条令。在《总队部服务规定》中,明确提出残留日军部队的纲领宗旨和行动准则。《规定》由第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署名发出,时间为民国36年(1947年)7月1日,用日文打印,16开25页。其内容包括总队长训、总队部训,及总则、服务与礼节、业务处理、会议、勤务、作息风纪等六章,有附表三种。其《总队长训》规定:“总队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一、经常坚持牢固之信念,为贯彻宗旨而迈进。二、挺身而出,担当中、日提携和亚洲建设之基石。三、和衷共济,以结成巩固之团结。四、千锤百炼,以培养精强之武力。五、自强不息,以振起质朴刚健之风气。”《总则》第三条规定:“总队部人员要领会《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及天皇关于结束战争诏书的宗旨,作为培养精神因素的根本。同时,要认真学习殉皇志士、烈士的精神,从而在总队长领导下,互相切磋勉励,朝着实践《总队长训》的目标奋勇前进。”

很明确,“复兴皇国,恢弘天业”是日军残留的纲领和宗旨。其必须树立的“牢固信念”,即贯彻、实现这一宗旨。而皇国,乃日本天皇制国体和国体;天业,天皇开创、扩张的基业。联系二战期间裕仁天皇发布的诏书及内阁召开的重要会议,则“复兴皇国,恢弘天业”宗旨之源出便十分清楚。1940年2月,日本举行“皇纪”庆祝活动,天皇向国民发布诏书,内称“尔臣民宜驰思神武天皇之创业,念皇图之宏远、皇漠之雄深,和衷戮力,愈益发挥国体之精华,以克服时艰,昂扬国威,回答祖宗之神灵”。^②7月,第二届近卫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纲要》中,采用“皇国”称呼,取代过去所称“帝国”,提出“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皇国

^①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B24-4-44-8-20。

^②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旺》(下),世界知识出版1996年版,第1032页。

之固是”。^①1941年12月,天皇发布太平洋战争宣战《诏书》中亦宣称:“……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深信依靠尔等众庶之忠勇,必将恢弘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②1945年8月14日“最后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在“圣断”中讲道,“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但愿此时此刻,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团结一致,以求将来的复兴”。^③而《军人敕谕》,则是军国主义日本天皇制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天皇制军队的立军之本。明治天皇于1882年1月颁布的《军人敕谕》昭示,“朕是汝等军人的大元帅”,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教育敕语》是明治天皇于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法令,它不仅是各级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力图把忠君报国思想灌输到每个国民头脑中。其“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臻天壤无穷,皇运扶摇”,成为战争期间支持日本军队的精神道德规范。日军战败残留山西,组建残留武装部队,制定《总队部服务规定》,正是贯彻、融汇了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皇国观念与战争理论,以训导和凝聚残留日本军人继续战争。与《总队部服务规定》同一时期形成、相互配套出笼的,还有《司令部业务规定》、《政治部业务规定》、《政治部实施业务大纲》、《任官、进级规定》等十余种规章制度。^④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从军队政治管理、军事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严密而具体地践行着《总队部服务规定》的总纲领,指导和规范着残留日军的部队建设。如《政治部实施业务大纲》^⑤中就规定:政治部业务实施的目的在于,使总队官兵贯彻部队存在的理念,掌握日、华协力的真正意义,促成巩固的团结。与此同时,建立同外部的合作体制,阐明世界形势,以期在整体方向的把握上万无一憾。实施事项为: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同日本的关联上,阐明目标理念的时期性和阶段性;确立恢弘天业的世界普遍性;使队员经常自觉地把部队同祖国直接联系起来;研究分析混乱的形势,阐明吾人所处的环境;阐明部队的现况,提供丰富正确的与其根本方向有关的情况判断的资料;努力培养下一阶段干部;设法同留晋日侨融合一起,确立合作体制;推动建立同中方机构及民众的相互援助体制,以巩固部队存在的基础;同省外尚未回国的日本人及日本国内建立联系,在各地之间相互迅速通报成果,以使采取共同行动成为可能,并实行交换信息,为将来物资、人员相互进行援助成为可能做好准备。

五 残留活动统一体制

从残留纲领“复兴皇国,恢弘天业”,把山西建成日本军国主义掌控的复兴基地出发,残留活动的策划组织者在首先实施强有力的、具有独立支配力的军队残留的同时,并着眼于建立残留活动统一体制,精心组织切入山西社会,特别是经济实业、特务情报的残留活动;同时,在残留日军日侨中建立社团、学校、医院、合作社,特别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文化“残留”活动,使残留日人在山西“牢固地扎根、生存”,在中国社会内营造一个“日本人地区”。据山西日侨俱乐部1947年1月统计数字,除军人外,残留日侨数为7279人。^⑥

日军日侨“山西残留”,经济方面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利用、掠夺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潜在生产力,服务于他们图谋的战败“复兴”。残留活动中,大批日本人进入太原铁路局、晋北矿

①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知识出版1996年版,第1028页。

②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知识出版1996年版,第1159页。

③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知识出版1996年版,第1458页。

④ 山西省档案馆藏,全宗:R24号。

⑤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24-5-333-99。

⑥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5-8。

务局、西北实业公司及下属经济实体。据1946年1月省政府秘书处签复征用日人数，仅铁路局即1205名，西北实业公司420名。残留活动统一体制主要策划组织者河本大作，侵华期间即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残留后又当起了西北实业公司顾问、经理部长，妄想继续把山西骨干企业的运营置于掌控之中。在日侨俱乐部的一次常委会上，河本大作发问：“山西的煤炭埋藏量有多少？你们连山西煤炭埋藏量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留在山西呢？”1948年5月山冈道武回日本，河本大作与之谋划招募“义勇军”，说如果阎锡山不能负担义勇军的经费，就与阎协商由义勇军从中共手中夺回已经解放的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所属工厂、矿山，如阳泉煤矿、灵石富家滩煤矿、宁武木厂等，或占领解放区的几个县，以达“以战养战”的目的。^①1949年2月，太原解放已成定局。为了在失去阎锡山的荫庇后军国主义势力仍能继续残留，河本大作等人又策划成立“山西矿业公司”，还梦想着太原解放之后，继续由日本技术人员负责该公司，以武装团体成员和日侨充当采煤工，利用山西资源，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出于东山再起的图谋，对特务情报活动非常重视。1946年1月，即由原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情报参谋指田国福，与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资源调查社”。^②之后，又增设第二资源调查社和雁北办事处。资源调查社专门从事特务情报活动，开展科学谍报、侦察谍报等业务，在基层设有情报站。其人员以残留日人为主，1946年约150人以上。在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政治部等机构，情报工作也是重要职能。“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政治部业务规定》中，详细规定了资料室业务活动内容，即进行欧洲、美洲、苏联、中共情况的调查；中国文化、社会、经济、边境、政治、法制的调查；东南亚及中近东的调查；日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调查。河本大作所在的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室，同样进行着特务情报活动，从那里不断发出标有“极密”字样的《情报记录》。残留日军日侨组织木曜会、水曜会、土曜会等，也把搜集情报，研究形势，组织专题报告，当作活动的主要议题。

在残留活动统一体制中，思想文化残留活动，为战败“山西残留”提供思想理念指导和精神文化支撑，也为“在山西建立一个日本人地区”搭建文化设施。策划组织者通过开展经常的政治、思想、文化活动，成立多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创办各类报纸刊物，兴办面向残留日人的学校，指导、团结、凝聚残留队伍，使他们坚定残留信念，坚持为皇国复兴和皇军荣誉，以武士道的牺牲精神，义无反顾地充当“残留英雄”，并能够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为残留活动的渗透、深入和日后东山再起，做好知识与能力准备。在残留日军部队，“纪元节”、“天长节”等纪念活动，被规定在必须的教育事项中。天皇《诏敕集》，印发到每个军人的手中，每逢规定的日子，都要进行“敕谕奉读”、“诏书奉读”和面向宫城“遥拜天皇”。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骨干分子河本大作，身任太原日侨自治会会长、山西日侨俱乐部委员长、山西武道会会长、桐荫（暂借阎锡山荫庇）会会长、迎晖（迎接日军）学会顾问等职，充当着残留活动的精神领袖。以河本大作、澄田睐四郎、城野宏、山冈道武等人为核心，成立了金曜会、木曜会、土曜会、水曜会等组织。为使残留下来的青少年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熏陶、学习文化与各科专业知识，组织者开办了晋阳学园、太原政经学院、晋阳高等工学院、大同日侨小学等成人院校与日侨子弟学校。残留期间，他们还创办《太原汇报》、《晋风》、《东风》、《迎晖》等报刊，成立文化社团、举办文艺汇演，组织亚洲文化会、亚民会中日联合委员会等。日军军国主义分子还举行专门仪式，为受处决的战犯“通夜烧香超度”。罪恶的“慰安所”，也重新张贴告示，公然开张。甚至为了使残留

^①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8页。

^②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B24—4—44—36—42。

人员念念不忘“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不仅残留日军司令部大楼称为“复兴楼”，向日本军人、侨民发放的烟卷名为“复兴牌香烟”，出售的香皂名为“樱花皂”，而且不少残留军人所起华名也有寓意，如“于复国”、“孙亚业”、“燕东兴”、“王耀武”、“武威”等。

六 继续战争，制造战祸

日军“残留”山西，组建武装部队，明火执仗继续战争，直接参加对人民军队的作战，同时对阎锡山军队进行训练，指导中国人打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新的战祸。三年多时间里，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东沁路作战、寿阳作战、晋北战役、汾孝战役、正太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事，也曾在忻县、大同等战斗中取得“战功”。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阎锡山反动政权每况愈下，附植于阎军的残留日军也遭到毁灭性打击。1947年5月正太战役中，残留日军第五大队即被整团消灭。1948年至1949年的晋中战役、太原战役，残留日军从溃不成军走向最后覆灭。

1948年6月，解放军于临汾战役后，乘胜发动晋中战役。在阎锡山“保卫晋中、固守太原”的作战方针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山西野战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赵承绶，与野战军副司令、“保安司令部前方指挥办公室”（5月30日“元副总司令办公室”改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前方指挥办公室”）指挥元泉馨，披挂上阵指挥晋中会战全局。残留日军教导总队，也由总司令今村方策、参谋长菊地修一率队，随赵承绶、元泉馨野战军司令部开赴前线。整个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阎军望风披靡，残留日军连战皆败。7月上、中旬，野战军司令部所率部队及残留日军，被圈在太谷、榆次、徐沟间方圆三四十华里的三角地带。虽有B29型飞机轰炸助战，地面部队接应救援，但遭解放军外围强势炮火与逐村阵地攻坚战打击，终致全军溃败。7月16日，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副司令、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留下“城破急败走，高粱田慨然翘首，唯乱云飞度”的最后俳句，在小常村被炮弹击中，又让部下补开一枪，结束了生命。残留日军教导总队也在徐沟温李青、戴李青，太谷南庄村、小常村、西范村等战斗中，丢下了180余具尸体，还有200余人被俘。其所属五个团中，教导一团团长小田切正男、教导三团团团长增田重之、军士二团团团长布川直平被打死，教导二团团团长住冈义一被俘。此役死亡的还有原日军炮兵大队长、太原绥靖公署炮兵训练团少将总教官松原太市。

晋中地区解放，太原成为一座孤城，阎锡山反动统治末日来临，残留日军梦幻也行将破灭，但仍在进行最后挣扎。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带着残留日军教导总队司令今村方策等人，从四周八圆、城外城里勘察太原地形，为阎锡山制定了《太原城周防御计划》、《中央军空运计划》、《炮兵集中运用计划》，以及拆毁民房、扫清视线等战术方案。10月5日，太原战役打响。在外围战斗与外围要点争夺战中，残留日军司令部少将部附岩田清一，指挥东山正面炮兵群，炮击解放军阵地。今村方策率教导总队，在太原东山“四大要塞”之一的牛驼寨，与解放军展开激烈残酷、反复数十次的争夺战，甚至违反国际法，发射“联二苯”毒气弹，造成解放军战士大量伤亡。据教导总队司令部部附、政工处长城野宏1956年交代，“仅在牛驼寨前面，就杀伤了1600余名解放军战士……并且在东山一带，与三十军、十九军共同杀伤16000人”。^①残留日军也损失严重，参谋长今野淳、参谋处长佐藤荣治等日籍官兵70余人死亡，其所属三个团，步兵一团团长早坂肇藏、步兵二团团团长相乐圭二、炮兵团长菊地修一，都身负重伤退下阵来。11月中旬，解放军英勇克敌，胜利控制牛驼寨。残留日军教导总队遂整体改编为炮兵队，在卧虎山等炮兵阵地继续作战。1949年4月20日，解

^①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放军向太原城发起总攻，在城东南双塔寺阵地担任炮兵总指挥的岩田清一，于21日晚更换便衣从寺院出逃，被解放军生擒。24日太原解放，龟缩于教导总队司令部“复兴楼”的残留日军全部做了俘虏。

残留日军“继续战争”的另一军事活动，是对阎锡山军队进行训练。1946年春，按照阎、日合谋组建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的任务之一，即“教练军官”。同年秋以日本军人为骨干组建的“机甲队”，其司令也即总教官。1947年3月，阎锡山“亲训团”成立。由山冈道武担任总顾问，岩田清一及80余名日本军人担任教官。从山西各部队调集将、校、尉军官及军士1000余人，组成1个将校队、2个尉官队、3个军士队，将校、尉官、军士各队的中队长，各排的分队长，也都由日本军人担任。7月，阎锡山又成立“亲训师”，全师11300余人。仍由山冈道武担任总顾问，训练计划均出自其手。师、团、营部设有日本教导官3至5人，各连配备日本教官3至5人。据1948年1月残留日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参谋处教育科统计，下属二团、三团、六团，特务一连、二连，第二通讯队，派往亲训师的日本教官为236名。从1947年11月开始，残留日军又担任阎军青年军官教导团（简称“青军团”）的教练任务，今村方策任总教官，岩田清一任副总教官。青军团下设一、二、三大队，1948年4月又增设第四、第五大队。5个大队下设18个中队、54个分队。各大队大队长分别由残留日军5个团的团长担任。连同中队长、分队长等日籍官佐，人数115名。按统计，1948年前半年，担任亲训团、亲训师、青军团与炮训团、机甲队教官的日本军人即五六百名。日军残留期间，还先后对阎军干训团、第八总队、第九总队、第十总队等军事组织，以及宪兵、炮兵、通讯、军械、辎重、工兵、战地医疗等兵种，进行了多方面的训练。太原战役中，甚至对阎军进行毒气战斗使用法、指挥法教育。作为军事残留活动的重要内容，残留日军的最终目的虽未能得逞，但对阎军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反动军队的战斗力，加大了山西人民解放战争的代价。

七 遣返与覆灭

侵华日军“山西残留”，虽经过精心策划、严密组织，但很快就被世界历史潮流彻底冲垮。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选择了坚持民族正义，为他们谋求幸福和利益的共产党政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日军战败“残留”，在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的同时，最终招致彻底失败。7000名左右残留日本军人，及数千残留日侨，经过4次遣返与战争中死伤、被俘，到1949年5月总体败亡。

残留日军日侨第一次大遣返，在1946年4、5月间。《波茨坦公告》第九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但军国主义势力策划实施日军“山西残留”，却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由于日军“残留”被中国人民警觉、揭露，也引起了军事调停“三人小组”的重视，日军残留活动在初期即遭遇打击和遏制。尽管策划组织者以就地复员、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及隐匿残留武装等手段，欺骗视听，继续残留，也仍有约3000人以上残留军人走上被遣返的道路，连家属及其他侨民，总数约6000人上下。其中就有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坂井直俊等人。据1946年4月第一军向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的报告^①，“我军定于5月5日将军司令部（第48大队）运送出境后，除因事暂留人员（军人）及留用技术人员（侨民）外，即结束运送工作”。文中对“有无尚未解除留用的军民及其被遣返估计”的报告

^① 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R1 2 125。

为：“军，无。民：太原1788名，榆次321名，阳泉131名，大同505名，共计2745名。尚有未了事务处理小组及其他暂留人员：山冈参谋长等军官23名，军士9名，士兵13名，军内雇员13名，共计58名。大同还有尚未运送完毕的军民，其人数不详。”但这里所谓“民”2745人，实际主要是“就地复员”名义下的残留日本军人。又，当月第一军的另一份报告^①称，“第四独立警备队（驻大同）以下人员无法与主力一起向原平集结：军官（含准军官）24，军士125，士兵522。以上人员均为原特务团人员”。依上述数字统计，仅第一军报告中遣返后继续残留人员即有3474名。在此统计数字之外，还有其他残留人员。另据1946年9月9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河北·山西地区残留人员概数表》^②：“太原：军（含家属）：世話部10名，战犯嫌疑14名，陪同证人14名，合计38名。民：留征用约630名，加家属合计约3000名，残留者约2千数百，合计5000名—6000名。总计：38名；另5000名—6000名。大同：民1181名，总计1181名。”综合分析，第一次大遣返后，山西仍残留日本军人约3500名至4000名，连同其他侨民，共约7000人左右。之后，残留活动组织者又新招募、日本军人、眷属与侨民进入山西。到1947年，残留日本军人和侨民又膨胀至万名以上。

1947年和1948年，残留日军日侨又有三次较大数量的遣返，其中军人遣返总数约在2000名以上。第一次遣返在1947年9月。遣返过程中，山西日侨俱乐部参与组成遣返委员会，河本大作以日侨俱乐部委员长身份介入，主张只将思想不良分子、捐客和无战斗力的老弱分子遣送回国，对有战斗力或有技术的人员则强制留晋。第二次遣返在1948年5月。当时，阎锡山反动政权每况愈下。很多残留军人对残留前途失去希望，对残留理念产生怀疑，也对日后生活感到不安，纷纷要求回国。残留活动主要策划、组织者，原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等人，也回日招募义勇军而一去不复返。第三次遣返在1948年9月。6月至7月晋中战役中，残留日军溃不成军，而太原战役也将展开，太原城处于四面围困之中。残留日军日侨惶惶不安，人心思返，仅教导总队及所属各团队遣返人数即698名。^③其中司令部遣返161名，与继续残留数187名相差无几。机甲队遣返司令、参谋长等84名。这几次遣返中，多数残留日侨也随遣归国，总数在7000人左右。据《山西省会警察局太原市外侨职业及国别人数统计》，1949年4月，残留日侨只剩下560人。

日军残留山西继续战争，被葬于战争坟墓和成为战犯战俘的官兵，约在1500名左右。1946年至1947年，残留部队在晋北战役、汾孝战役、正太战役等战事中即严重死伤。1948年的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伤亡更加惨重。据教导总队1949年1月《阵亡日籍官长请领抚恤金统计表》^④，1946年至1947年，死亡日籍军人152名（含大同总队）；1948年晋中战役，仅教导总队死亡人数即184名，同年10月至11月太原战役之东山牛驼寨作战，教导总队又死亡73名，总计为409人。这尚不包括教导总队1949年1月后死亡数，大同总队1948年至1949年死亡数，机甲队死亡数，及其他残留军人死亡数。据现有资料统计，残留日本死亡总人数在500人以上。残留日军被俘人员，总计也在千数以上。档案材料记录，1947年第十总队被俘官佐400余名，其中包括日籍军官。又据1948年《教导总队晋中战役阵亡、失踪官兵暨随带着属统计表》，显示失踪日籍军人200余名，多数当为被俘。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教导总队司令部“复兴楼”内残留日军全部做了俘虏，各处散兵败将也在太原战役及太原解放后被俘被捕，总数六七百人。其中，包括残留活动策划组织者城野

①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111。

②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2-3-48-53。

③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90-57。

④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183-1-8；25-37。

宏、岩田清一。教导总队司令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氰化钾自杀。原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则于太原解放前夕，在阎锡山安排下化名陈春英潜归日本。同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大同总队残留日军除阵亡、遣返者外也被俘被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后，图谋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残留”梦幻彻底破灭了！

(作者孔繁芝,山西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尤晋鸣,山西省社科联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抗战飞行日记》

龚业悌著,龚绍英、龚绍东、龚绍雄、龚绍豪整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72万字,45元。

龚业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分队长、副中队长,和高志航大队长的僚机,参加过1937年“八·一四”空战和多次空战,共参战183次,个人单独击落日机3架,与战友协同击落日机6架,击伤日机数十架,龚在空战中重伤3次。《抗战飞行日记》是作者在1937—1938年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日记。这部日记不仅记录了作者个人参加抗日空战的战斗经历,也为广大读者和抗战史研究者提供了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值得重视。